



新千年的钟声渐远渐渺，一切重归平静。冷眼四望，“太平盛世”仍只是个遥远的梦。北约东扩及“战略新概念”出台，科索沃战争，中国使馆被炸，NMD及TMD呼之欲出，日美“新防卫指针”相关法案通过，“两国论”再起浊流……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过去的1999年已发出了足够多的警示，我们仍需时时警惕，因为世界并不太平。——编者

中国面临的战略安全环境

□ 阎学通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获得了一个“四化”建设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和平环境。在走入新世纪之际，中国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战略安全环境，是国人所关心的。我们虽不可能先知先觉历史的具体进程，但是可以预测我国战略安全环境的基本走向。

卷入战争的危险将上升

90年代初，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政治孤立和军事制裁的政策，但我国并没有卷入战争或有军事入侵之虞。随着台湾岛内分离主义势力的不断发展，1996年我与美国因台湾问题在台湾海峡形成了军事对峙。1999年李登辉改变台湾当局变相独立的政策，发表“两国论”，实行了公开独立的政策。这使得两岸因台湾独立在台海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加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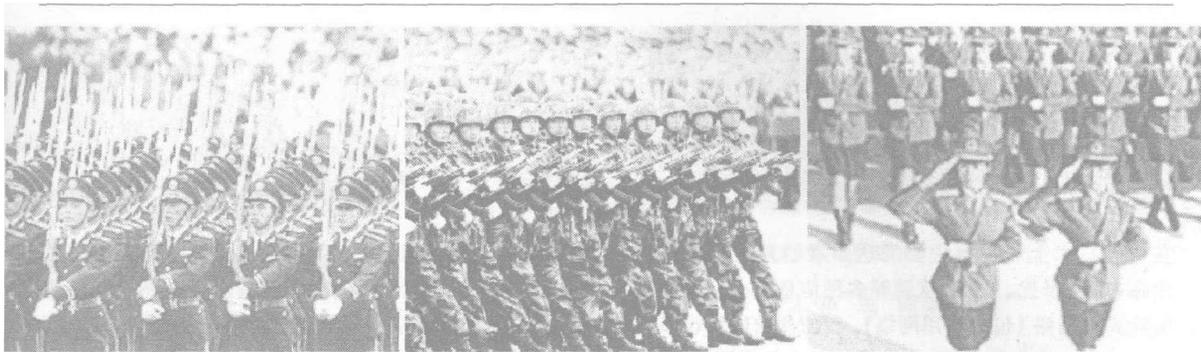
今后十年，台独势力将有进一步发展之势，因此我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也有进一步增长的可能。近期看，李登辉在2000年3月台湾选举之后至其下台的5月20日之前，还可能以政府文件的形式进一步将其“两国论”的独立政策法律化。他将在公开独立的路上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的选举结果。越是在大陆政策上与其不一致的人赢得选举，他就越要冒险

将其台独政策官方化。只要李登辉走出这一步，台海地区的安全形势就必然要受到严重的威胁。从中期看，由于美国与台湾的大选在同一年，这种时间巧合使得美大选前的政治气候很容易朝支持台独的方向倾斜，因此2004年和2008年将是台独分子在台海地区引发军事冲突的危险时间。

今后十年我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虽然要大于90年代，但这种局部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或引发对我国的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很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上发生过多起局部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虽然都使核大国卷入其中，但战争还是控制在局部战争水平上，而且大国之间也未实行相互大规模军事入侵的战略。其原因可能是多重的，但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只要新军事技术的发明在今后十年还不能防止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台海军事冲突还不致引发世界战争或陷我于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危险之中。

面临的战略压力将加大

苏联解体后，中美战略关系的性质由合作为主转向对立为主。由于美国是冷战后的惟一超级大国，也是



最有实力对我施加战略压力的国家,因此双边战略关系的性质转变使我面临着美国巨大的战略压力。但90年代初期,国际格局正处于过渡时期,大国间的战略关系并不明朗。美国同时担心拥有巨大核武库的俄罗斯东山再起,担心日本与它争夺世界霸权,担心欧洲一体化后与美国抗衡,因此美国并未以中国为主要潜在竞争对手。90年代中期,大国战略关系的模糊性消失,中俄、美日、美欧三大战略关系基本明确,于是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主要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1997年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评估,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担心。

今后十年,中美结构性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将可能成为亚太地区最主要的战略矛盾。美国称霸世界的政策不可避免地要与世界各主要力量之间产生战略矛盾,但与中国的矛盾最为突出。美国要在21世纪称霸世界,而中国“四化”建设的目标是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两个战略目标形成了一对结构性的矛盾。如果中国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中国六倍于美的人口将使中国的GDP远远大于美国。当中国GDP等于或大于美国时,美国就无法在世界上称霸。而且,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很可能快于日本、欧洲和俄罗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美国就越担心。中美的地理位置以及中国十年内仍将是地区强国这两个因素将决定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对该地区多数国家产生重要影响。

中美战略矛盾的深化有可能促使美国增加对我军事压力。90年代美国对我施加的战略压力主要是政治压力,而今后十年则可能更多的是军事压力。近年来,国际军控舞台的中心已逐渐从欧洲移向亚太地区。美国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计划,针对中国的色彩越来越浓,中美在国际军控领域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克林顿在1999年的国情咨文中已提出,美将在其后的六年里增加1100亿美元的军费,这将使美国年国防开支超过俄罗斯、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六国的总和。美国一超军事实力的进一步提高,将促使美国倾向于在亚太地区采取单边军事行动维护其战略利益。而且美国会更

多地从军事上支持台湾提高军备水平,从政治上支持台湾“扩大国际空间”的政策,这些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增加我国防现代化的压力。特别是,如果美国按计划于2007年部署TMD并将台湾纳入这一体系,我面临的战略压力将变得异常严重。

美国对我施加军事压力虽可能增加,但中美之间仍有战略安全合作的空间。今后十年,出现一个威胁中美安全的共同战略威胁的可能性较小,但防止中美之间发生正面军事冲突则是双方的共同战略安全利益。为了防止台湾问题引发中美之间的战争,中美双方将有发展安全合作的需求。至于双边安全合作能否有效地防止战争则取决于双方对危险根源的共识程度。

非传统安全问题将突出

在90年代初,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走私、贩毒、非法枪支贩卖、环境污染、跨国犯罪、经济情报战等,已经出现,但还构不成战略威胁。这些问题到了90年代末明显严重了。以贩毒和走私为例,1997年中国逮捕毒品贩和查获海洛因分别是1991年的2倍和2.5倍,查获的走私商品价值则为1991年的33.5倍。而且90年代初并不突出的国际金融危机、信息安全和恐怖主义破坏活动到了90年代末也已成为严重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今后十年我面临的战略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将变得突出起来。依照中美达成的协议,我国将在五年至六年内基本实现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接轨,这也必将加快我经济体系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全面接轨。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后,原有的行政屏障所起的保护作用将大大下降,当国际经济危机发生时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更加直接的冲击,冲击烈度也将更大。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印度尼西亚的打击结果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因此,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威胁将是有战略性质的。

今后十年,我将不可避免地要进入经济全球化的主流,由此信息安全将是我面临的另一个战略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参加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就必须开放信息边界。信息安全将关系到众多经济部门的安全。我国



在信息技术上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使我国面临窃听、干扰、监视、欺骗等多种信息安全威胁。我国计算机网络(包括军用网络),所使用的网管设备和软件基本上是美国公司的产品,绝大部分采用TCP/IP协议,微机芯片都是INTEL的P系列,软件基本上是WINDOWS和NT。这些因素使我国的计算机网络安全性大大降低,被认为是易窥视和易打击的“玻璃网”。最近已发现在PⅢ芯片的计算机上运行WINDOWS98时,出现过自动定期收集信息的现象。

鉴于以上分析,可以说,今后十年我国的战略安全环境将不如90年代,因此笔者认为,为“四化”建设

争取一个较好的战略安全环境将是今后十年一项艰巨的战略任务。为了使今后十年的战略安全环境不致恶化太厉害,就有必要采取预防性的安全战略,以防止军事冲突或非传统安全危机的发生。我国需要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威慑战略的研究,抑制台独活动导致战争的危险;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特别要注重减少与美国的战略误解,减少美国的战略压力;加快战略经济部门的改革,让民营企业进入这些经济部门,从整体上提高我经济体系的战略竞争能力与抗危机能力。▲



周边安全环境回顾

1999:

□ 孟祥青

“三变”与“两弊一利”

1999年,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错综复杂,机遇和挑战并存,不利方面和有利方面都有增加,反映出世纪之交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有三。

战争的因素有所增长,军事安全问题凸显。科索沃战争虽然发生在远离我国的欧洲巴尔干

地区,对我国的安全环境不构成直接重大的挑战,“科索沃模式”也不会被简单地套用于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但美国及西方大国通过这场战争推出的一系列新的战略理念,如北约的“战略新概念”、美国的“新干涉主义”、欧盟的“第三条道路战争”等等,都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指导性,标志着西方国家进入到对外干涉的新阶段。这无疑对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构成了威胁。特别令人震惊的是,美国悍然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恶化了中美关系,其负面影响短期内难以消除。与此同时,日美军事合作的范围空前扩大,军事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年初,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相继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案”、“自卫队法案修改案”和“日美物品劳役相互提供协定修改案”,将日本捆在美国的战车上,更加紧密地纳入美国的亚太战略,使日协美出海作战成为可能。“新指针”和“相关法案”未把台湾海峡排除在所谓“周边事态”之外,这将使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突出出来,对中国统一构成潜在威胁。“新指针”将中国作为防范的对象并作出“战略性预防”,中国成了日美安全条约的“假想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李登辉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两岸关系定位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上,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迈出了极其危险的一步,从而导致台湾海峡局势高度紧张,我领土完整和主权安全面临现实重大的挑战,和平统一祖国变得困难重重。此为一弊。

民族、宗教矛盾加剧,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增大,政治安全提上重要议程。科索沃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是塞族与阿族及东正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我周边国家在1999年发生的一系列动乱或冲突